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 中华文化元素 钱币

ZHONGHUA WENHUA YUANSU QIANBI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徐承泰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文化元素  
ZHONGHUA WENHUA YUANSU

冯天瑜 姚伟钧 主编

# 钱 币

QIANBI

徐承泰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钱币 / 徐承泰著. — 长春 : 长春出版社, 2016. 12

(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 冯天瑜, 姚伟钧主编)

ISBN 978-7-5445-4689-8

I. ①钱… II. ①徐… III. ①古钱(考古)—文化—中国 IV. ①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2195号

## 钱 币

著 者: 徐承泰

责任编辑: 周哲涵 胡 新

封面设计: 王国擎

出 版: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吉广控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厂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1067999

## 总 序

由别具慧眼的长春出版社策划的本丛书，以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诸事象为描述对象，试图昭显中华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本义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相同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如非金属元素氧（O）、金属元素铁（Fe），是组成具体自然物——氧化铁（ $\text{Fe}_2\text{O}_3$ ）的基本质素。

作为化学术语的汉字词“元素”，由日本江戸时代的兰学家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所著《植学启原》（1834）和所译《舍密开宗》（1837）

中创制，是对荷兰语 grondstof 的意译。清未来华的美国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格物入门》（1868）中创汉字词“原质”，意译同一西洋术语（英文为 element）。清末民初，汉字词“元素”自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取代“原质”。1915年，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任鸿隽（1886—1961）在《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化学元素命名说》，为中国较早使用“元素”一词的案例。<sup>①</sup>

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文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性质的构成要素。

本丛书论涉的“中华文化元素”，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融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理论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非排他性信仰系统、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

① 任鸿隽，自译：《中国科学社成立宣言》，载《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2月），第5页。

纷繁具象之中，并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

## 二

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和“可居可游可赏”追求；民间民俗文化涵泳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使用“中国红”（体现生命张力）、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感，等等。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中华元素的一个案例。

世界各种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sup>①</sup>

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

① 李学勤《汉字研究理论：  
从文字到汉字本质的新说》，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他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sup>①</sup>此论阐发了汉字这一中华元素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做出回应，傅斯年（1896—1950）在1933年著《夷夏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

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sup>②</sup>

这是中国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中华元素”做出的提取。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嶋定生

①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②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1933年。

(1919—1988) 在二战后所著《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中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圈”模型。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概括汉字文化圈的诸要素（或称“中华元素”）：

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中，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而其他三项，即儒教、律令制、佛教，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sup>①</sup>

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一书中论述“汉文化圈”的特点：

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sup>②</sup>

① [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6—8世纪的东亚》，高明华等译：《日本学刊中国史论丛》，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页188页。

②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傅任冲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这里着重表述“中华元素”之一种——汉字的功能，汉字深刻影响东亚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汉字文化圈成为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

### 三

“中华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突显四大发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元素的现代展现；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如英国元素、印度元素、日本元素、印第安元素）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文化元素并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它们从来都与民族、民俗、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丽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诸方面的具体文化事象和文化符号之中。中华元

素之于文化事象，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文化事象（如江南园林、八大菜系、春节中秋等节庆、书画篆刻、昆曲京剧、武当少林功夫）的生动展现中提取中华元素的魂魄，昭显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如深蕴和谐精义的太极八卦图，代表四方、四季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中央的麒麟）包蕴的精义，是本丛书的使命。

本丛书由阐发体现中华元素的若干文化事象（如园林、饮食、节庆、书画、宫殿、戏曲、服饰、汉字、武术、钱币、宗族、书院、姓名、茶等）的系列作品组成。

中华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遗产创新的自觉性。

抉发中华元素还有一层意义：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丛书的选题及其撰写沿着“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避免一味虚玄论道，也不停留于文

化现象的就事论事，而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现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冯天瑜

2016年10月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前 言

关于钱币的定义，在学界颇有争议。有的人认为钱币只包括贱金属铸币，有的人认为还应包括纸币，更有人将纪念章、各种信用票也囊括其中。实际上，关于钱币的概念，有几点应该明确：第一，从性质上看，属于经济学的货币的范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经济学对货币的通行定义，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钱币，必须是用来作为交易媒介使用的。第二，从形态上看，钱币本身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属于人文概念范畴，因此，钱币是指有人为加工制造痕迹、有一定形状及价值单位的特殊物品。第三，从内容上看，古代钱币和现代货币的研究，分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性质迥异的学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对象中有貌似古代钱币的内容，便将其纳入同



一个研究范畴之中。因此，我们所说的钱币，是指特定历史时期曾经流通的货币，即古代钱币。这样，我们就可以给钱币——准确地说是古钱币，下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价值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其中金属铸币以方孔圆形钱为主，包括先秦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用于流通领域的非方孔圆形铸币，质地以铜质为主，包括金、银、铁、铅、锡、镉、纸等。

钱币与货币，在概念上有重叠之处，但也有区别。其相同点在于双方都具有交易媒介的性质。其相异之处则在于：“钱币”是指有人为加工痕迹的金属铸币及纸币，它是“货币”的一个部分；“货币”包括一切用于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可以是金属铸币、纸币，也可以是实物或其他。

中国古代对于钱币的名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其中先秦时期的钱币的名称，有“币”“泉”“布”“钱”等说法。裘锡圭先生考证，在先秦时期齐地，“刀”是对钱币的通称；还有学者认为“𧇧”（𧇧，圜的古字）也是先秦铸币的名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汉代以后“泉”是其原始称呼，“钱”为后起意义。《国语·周语下》载：“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注：“古曰泉，后转曰钱。”清末以后，学者们基本认为“钱”为货币之本字，“泉”为后起意义。

秦汉以后，普通铜钱一般称作“钱”，《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屡见“钱”字不鲜，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也多次见到“钱”字，如《金布律》即有“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的记载。王莽时期大兴复古之风，改称“泉”“布”“刀”，但时间短暂。

宋代以后，受洪遵《泉志》一书的影响，学术界又多称钱为“泉”或“泉货”。民国时期亦有称“泉币”者。194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提出了以“研究古今泉币，沟通中外学界，交换知识，联络同志”为宗旨，并发行有连续出版物《泉币》杂志。

“钱币”作为一个名词出现，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下》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这时的“钱币”一词系分指金属铸币和白鹿皮币而言，与后世“钱币”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中有《钱币》两卷，所述者皆金属铸币，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钱币”一词的含义已非常接近，但其后应用不广。20世纪50年代，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屡屡提到“钱币”一词，从内容上看，指铜、铁等贱金属铸造的流通货币。其后，“钱币”一词逐渐推广开来。

“货币”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陈寿所著《三国志》。《三国志·糜竺传》云：“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但此处的“货币”一词，为其原意“财物”之义。南北朝时，“货币”一词的含义与今天已相差无几，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光武帝纪》：“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钱币还有一些有趣的别称，例如“阿堵物”“孔方兄”等。

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以外地区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大约是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今土耳其一带）。公元前5世纪，被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经说过：“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指吕底亚人）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685年至前652年在位的吕底亚国王吉易斯曾铸造过一种金、银合金的钱币。这种钱币外形略呈椭圆，钱的正面铸有动物图案，一般认为是狮首，背面是密集的条纹，称为“staters”，源自希腊语，表示“标准”（standard）之意。稍晚于吕底亚人，希腊埃伊纳岛的阿哥斯国王费当铸造了银币，币面饰龟纹。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把铸币带到了罗马。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罗马人仿造希腊人的钱币，铸造了自己的铜币，

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后，罗马人铸造了自己的银币。在非洲大陆，约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人把源自希腊的铸币带到了埃及。公元前4世纪中叶，埃及法老塔赫开始仿造雅典货币铸造银币，币面亦为猫头鹰图案。但埃及人对于金属银块与银币的概念似乎并不明晰，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埋藏物中，除了完整的银币外，还发现有切碎的银币及银锭，显而易见，他们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切割称量交易。在亚洲大陆，公元前5世纪初期，波斯帝国开始仿照吕底亚人铸造金银币，图案为狮子与公牛。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前后曾流行过具有自身特点的带有戳印纹的不规则椭圆形银块和铜币。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铸币风格影响了印度，印度的货币形态从此打上了希腊文化的烙印。就这样，发轫于吕底亚的钱币文化，被希腊人和波斯人带到世界各地，完成了它对世界钱币文化巨大影响的传播过程（中国等东方地区除外）。因此，这些地区的铸币，钱面一直保持圆形，以图形为主，辅以文字的传统，与中国钱币的形态结构和以文字为主的风格迥然不同。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东方钱币文化的发祥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集中体现在内方外圆的形态、高挺的边框和以文字为基本装饰内容。此外，





还表现在铜钱长时期处于主要货币的地位。彭信威先生认为：“中国以铜为主，希腊以银为主。这种不同并不一定反映两国的贫富，可能是货币在两国的流通范围和流通深度上有所不同：希腊的货币，主要用于对外贸易，所以单位价值大；中国在战国时期的货币主要用于人民之间的零售贸易，所以单位价值小，大数目的支付用黄金。”

中国古代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大致不晚于商代，是以某些实物作为交易媒介的。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物品比较多，主要有天然贝、布帛、粮食作物、金属称量铜块等。其中天然贝在商代甲骨文及商周铜器铭文中多有记载，应是商周时期的重要交易媒介，商周金文记录中赏赐最多的物品就是贝，而且有直接以贝支付购买的例证。与此同时，金、银、铜、铜包金、铅、玉、骨、蚌、石、陶等质地的仿贝也开始出现，以骨贝多见，其次为石、蚌、铜贝，其他材质较少。山西侯马考古出土有陶质贝范，显然是用来铸造金属贝的。如果说金、银、铜、玉等因其本身价值或仍可作为货币，那么骨贝、蚌贝、石贝、陶贝显然就仅具象征意义了。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前 1735—前 1463）墓地中，真贝和蚌质仿贝同时出土，随葬真贝的墓主，身份要高于随葬蚌贝的墓主。由此可以推知，此类仿贝应属冥币性质，权贵者随葬金银铜玉，位卑者则用骨蚌石陶。